



■七十年代尖沙咀火車站的拆卸雖有過爭論，甚至出現過有組織的保護行動，但始終說不上是廣泛的民間動員或建制內外政治議論與行動的焦點。



■1971年4月，香港大學約一千名學生在校園內示威，抗議日本侵佔釣魚台列島。



■七十年代中環眾多英式大樓之中，以郵政總局最具氣派。但這卻未能幫助它逃過拆卸的命運。舊日城市面貌急速轉變的同時，整個城市也似乎在重新編寫歷史和塑造它的性格。

N城記：北京/上海

文：白金

楊奎松：重寫革命史

因為是在「7·21」大雨的次日舉辦的「直面中國革命——楊奎松新書對談」活動，連主辦者也不免自嘲沒有提前看黃曆，現場未到的嘉賓成堆，比如哈佛大學教授裴宜理、章詒和、章百家等均因班機取消或延誤不得不缺席對談。

中共黨史研究大家楊奎松這回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了他的《革命四書》，包括《西安事變探新》、《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間地帶」的中國革命》以及《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熟悉楊氏著述的讀者都明白，這些書均非新著。楊奎松自己的解釋是，把它們集中起來，實際上是為了出選集，「另外也確實可以做一個階段性的總結」。

當然，比起之前的版本，精裝套裝配以精美插圖的新版《楊奎松著作集：革命》非但沒有刪減，反而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楊新撰的總序，也表達了自己對中國革命史的最新思考。

這套書的引人注目處除了內容，當然還有它的裝幀。我們見慣了代表革命的大紅，這套書也用了紅色，但不是大紅，而是有沉澱的紅色，似乎折射出作者的思辨能力，沉潛、雅致，整個書籍裝幀與內容呈現特別協調。

黨史界素有「南高北楊」之說，英年早逝的高華雖佔有材料不多，卻因其能從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材料中得出一般人得不出來的結論而為人欽佩；楊奎松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子，他善於利用新材料，並能把新舊材料結合起來，拼出不為人知的歷史事實。他們倆基本代表了中共黨史研究的兩條路子，但是殊途同歸，都是走實證主義的路子。

今年59歲的楊奎松1982年大學畢業，之後一直從事歷史研究，他的志向是把中共黨史重新寫一遍。為了寫這部歷史，他從中共誕生之前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從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共產黨和蘇聯的關係等方面入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正好30年。「經過這麼長時間，到現在也就剛研究到五十年代。換句話來說，我在2000年以後開始做建國後的歷史研究，建國前的歷史研究基本上告一個段落了。」出這套書，也有把前面的研究稍微做一個了結的意思，以便今後全力以赴地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

為什麼楊奎松立志要重寫中共黨史，重寫中國現代革命的歷史？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認為傳統的或者官方的說法有太多的片面性，不能完整的反映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儘管到今天為止我並不認為這四本書就已經很好的或者很全面的回答了大家想要了解的很多問題，但是我相信我的四本書或者我對歷史的這種解讀，和官方、和今天流行的傳統看法有非常大的區別。」

楊奎松強調，這個區別不在觀點。「我從來不試圖在觀點上和傳統、正統的黨史說法進行正面討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假如我把自己定位為歷史學者，把中共黨史定位為歷史研究科目的話，我們最主要的任務是還原，要盡最大的努力來還原歷史真相；如果我們看到的只是片面的歷史，很難真正了解歷史的具體情況或者真實情況。」

另一方面，楊奎松研究黨史根本性的初衷，更多的是出於現實關懷，希望通過現實中的很多問題激發對歷史的回溯或者反思。很多歷史話題是從現實中提出來的。「我非常關心的就是今天這個社會是怎麼來的。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回到歷史當中去，要了解歷史是怎麼走來的。同時還要想辦法盡可能地用自己的努力，用大量的史料來分析、討論歷史是怎麼發生的。」

楊奎松承認，他的革命史這一部分的呈現和研究，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完整或者說不全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我的書的討論基本集中在精英政治，集中在上層，而不是下層，還需要有很多下層研究才能深入地回答今天或者後來共產黨、國民黨誰勝誰敗的根本原因。」

儘管如此，楊奎松重構中共黨史的研究範式和成果，已經被人認為「將來你是沒辦法繞開它做中共黨史的」，中共黨史真正脫離意識形態，真正變成科學，是從高華、楊奎松這代從事當代黨史研究的人開始的。他們相信，一個民族必須面對他們真實的歷史，過去的歷史會影響今天。執政者需要有足夠的勇氣，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看到人類歷史發展的走向和未來。「如果還是完全從過去的思維邏輯出發的話，我們永遠走不出來。」

解構七十年代的香港神話

「我在1970年考『升中試』，同年9月開始唸中學。中學、預科、大學的求學階段，在1970-1981年間度過。可以這樣說，自己的青年成長時期，都在七十年代發生。」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自序

文、攝：梁小島 部分圖片選自《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



■呂大樂在香港書展



■七十年代初，香港街頭家長送孩子上學。

繼《唔該，埋單！》、《四代香港人》之後，香港知名學者、社會學家呂大樂的論文集《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後文簡稱《七十年代》），於今年香港書展面世，再次對當代香港社會的建構與形成進行探討和挖掘。和前兩部一樣，雖說是學術文章，但論述和筆調都更接近社會觀察筆記。為什麼是「七十年代」？除了那是呂大樂個人成長中，認知和知識儲備逐漸成熟的重要階段，還因為這個年代已成為言說香港或者定義如今香港的重要坐標。不過，教授告訴我們，這個坐標存在很多的誤讀和幻影，且被不少人忽略了。

他對記者這樣描述自己的青少年：從小在屋邨長大，唸初中成績不好，於是避往校徽、扯掉校服領結，混進電影院狂看李翰祥、呂奇等人的電影，「那些後來考進大學或者讀了些書自認有文化的人，當年是看什麼風月片、爛片的。他們要麼忙着搞社會運動，要麼就參加什麼沙龍聚會。像我這樣這麼投入（大眾生活），又能寫的人很少。」這也形成了他後來社會學研究的不同取徑：從主觀感受出發，注重個體經驗，並由此呈現出的另類「生活史」。

好年代下的社會流動

在《七十年代》一書中，呂大樂也試圖對大眾的「70年代情結」做一個重新梳理。在他看來，那個年代被灌注了太多的神話，不只是小老闆、中產階級，就連街坊小市民都視之為他們的「好日子」。可是，經歷過殖民地政府時期的他，明明記得70年代初的治安混亂，屋邨常見搶劫的「箍頸黨」，甚至提到殖民地政府，學生們會產生反感，「我們必須記下英國的各種度量單位，1磅有多重，或者1英里有多長。還有中學讀地理，中國地理部分內容很少，英國的地理根本就不讓我們讀。我們要弄清楚的是澳洲或新西蘭的地圖。」他發現，其實有很多所謂的集體情緒、理解事情的心態，是事後才形成的，「我的目的很

簡單，只在於重新開放閱讀那個時期的香港社會的方式，令認識、理解、分析都可以較為立體和多元化，而不要不停的重複那些近乎固定的看法。」

對於一般市民大眾所念茲在茲的「好年代」，呂大樂認為，要區分「殖民政府的所為」和「個人或家庭的滿足」，「並不是因為香港是殖民地，所以才出現這些『好』，但當時經濟發展蓬勃，香港社會有很多渠道是開放的，如果你爭取到了，就能成功。這應該歸功到開放的制度而不是殖民地制度。」

因此在書中，處理「殖民地生活經驗」佔據了主要部分。更有意思的是，呂大樂從香港人所具有的「政治冷感和疏離」中找尋到正面的讀解。一方面固然是保持自己與殖民地政府的距離（亦是對政府反感的結果），另一方面，正是這種距離下的空間，保存了香港民間文化和思想的多元和活躍，再加上冷戰環境下在香港的「左右」角力，使得更多香港人傾向在體制內尋找個人發展的機會。「而這時經濟快速發展，殖民政府也開始回應社會訴求，使得普通家庭的生活得到改善。」呂大樂還記得，那時住屋邨的家庭婦女們，都有接製衣廠外單的車工經驗，幾位婦女聚在一起，甚至能自組成立開一個小加工廠。80年代後出現的對香港人的總結「獅子山精神」，其社會源頭便從70年代而來。

現在再說「獅子山精神」，他認為時代變化，需要格外警惕，重新分析，「當黎耀祥當上影帝時，很多人還是開心的。覺得他飛這麼久，終於翻了身，也說明現在的香港人還是喜歡這樣的拚搏故事。但如果和70、80年代作對比，就能發現那時的社會環境比現在開放。不光是思想上的，社會還有很大的流動性。比如教育，我那個年代教育是很殘忍的，任何人不論出身、家庭背景，都由考試決定。但現在社會多了渠道，學校、學位什麼都可以買，那我們怎樣去對待那些買不到的人，讓他們可以繼續生活，實現他們的目標？

是以前對我們太好，還是現在對我們太差？這是我們要檢討的。」

被主流遺忘的生活史

幾年前，呂大樂有機會進入英國國家檔案館，讀到了後來公開的70年代港督麥理浩執政時期的機密文件，正是對這些政府文件的解讀，為他的批判視野提供了更多層面的理據。作為上任時間最長的香港總督麥理浩，一直以來都獲得香港人一面倒的正面評價。他在任內對貪污（「廉政公署」的成立）、對教育（推行9年義務教育）、對房屋和醫療方面的政策，被認為是令香港走向繁榮之路的開始。在呂大樂的批判視野中，曾做過外交官的麥理浩，他的施政方針與政治考量，並非出於個人的善意，而是處處充滿著「外交視野」。呂大樂在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對麥理浩的分析，便是處理殖民經驗中，從上而下的「殖民政治」。在眾多對麥理浩的讚揚聲中，呂大樂發現，反而是後者的保守取向，令後來香港的勞工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留下了致命的問題。

「當然我只是提供了一個不同的分析角度。我希望能重新為70年代打開一個話語空間，也不想很快便得出另一種結論。對70年代重新深入的理解，它的重要性在於，會影響我們如何閱讀和分析當代香港的社會轉變。」

至於對香港70年代的發掘，呂教授說，還遠未結束。他更想寫一部類似香港生活史的著作，「但香港的材料和統計太少了。」所以他還是會大量借助他個人的經驗，「比如我曾在那個年代看了不少爛片，大多都很受歡迎，票房過百萬。看這些電影的是什麼人？拍片的又是什麼人？香港電影文化不會講這些。還有，70年代香港有好幾間唱片舖很出名。那時買不起黑膠唱片，有一個方法就是拿空白磁帶去那裡付費錄製。如果是新專輯面世，錢還要給得多一點。去那裡轉的人，之間也會交流信息。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大家是如何發掘資訊的呢？我也很想講。」

要刊書事

圖、文：Cate

The New Yorker 《紐約客》30/07：

享有世界聲譽的波蘭小說家Witold Gombrowicz（譯名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的一生，被流放和晦澀所籠罩。但直到他的生命中的最後幾年，甚至是他死後，他的一些重要作品才逐漸受到承認和欣賞。其中，他的代表作品之一Fragments of a Diary，最近終於發行了英文版本，並且遵照作家遺願：只發單行本。這本書收錄了他曾在波蘭文學期刊上發表的專欄，那段時期，他為躲避蘇聯的入侵，而流亡海外。



在這些文章裡，作家用非常個人化的書寫方式，展現了他內心的獨特思考。比如，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討論實施民主的弊端，而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則詳細地講述了他日常生活中的細節。當然，對祖國波蘭及其未來的複雜感情是此書重要的主題。

The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24/07：

每一年暑假，美國弗吉尼亞大學都會舉辦一個夏令營，吸引圖書管理員、書商以及對珍貴古董書有興趣的人參加。古董書夏令營的學生，需要在一周內密集地上課，學習書籍歷史的不同面向。比如，有的課程是幫助學生認識和分析所有用來做書本的紙張。對紙張質量的鑒定，可以推斷出該書是在何處，由哪家出版社出版。學生也可以學習到如何為古董書寫一份學術目錄，從多個角度和面向去準確描述書的結構和狀態。這個夏令營也會涉及到一些近年來書業的發展話題，比如電子書以及商業出版的歷史。該活動的目的，不僅是讓學生成為好的古董書收藏家，更是讓他們了解和愛上書的歷史。



Newsweek 《新聞周刊》23-30/07：

在英語世界，不只有娛樂圈，所有成功的女性，她們的私人生活總是備受注意。一方面，這些人在公眾面前的形象充滿智慧、運氣和財力，另一方面，她們細膩的女性情感經歷卻遠遠未及表面那樣一帆風順。匈牙利裔美國著名作家及記者Kati Marton，最近出版個人回憶錄Paris: A Love Story，將她兩年前痛失丈夫的經歷記錄下來，以文字治療痛傷。題目以巴黎為中心，是因為Marton的很多重要的生命轉折都發生在那裡：念大學、駐巴黎站記者，以及與她後任丈夫的邂逅。在沉重、憂傷的筆調所鋪陳的生活細節中，她也毫不保留的談及了自己的外遇。作為對愛人的悼念，也是自我的懺悔。



The Guardian 《衛報》25/07：

2012年英國Man Booker文學獎的初選名單已經公布，名單上出現了很多令人意外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評審委員們所說，他們是在挑選「小說」而不是「小說家」，也就是說，不要指望在名單上看到很多享有盛名的作家。很多首次發表作品的新晉作家榜上有名，比如Ject Thayil的Narcopolis，講述的是印度的鴉片吸食者的故事。比如Rachel Joyce的The Unlikely Pilgrimage of Harold Fry，是關於一個男人的冒險之旅。當然，老薑也是有的，比如Nicola Barker，他的The Yips，描述了一群在酒吧買醉的奇特的人。還有Hilary Mantel，最近剛出版了一本歷史小說集。

